



docsriver.com商家本本商家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经典译丛 |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书店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资本及其结构

[德]路德维希·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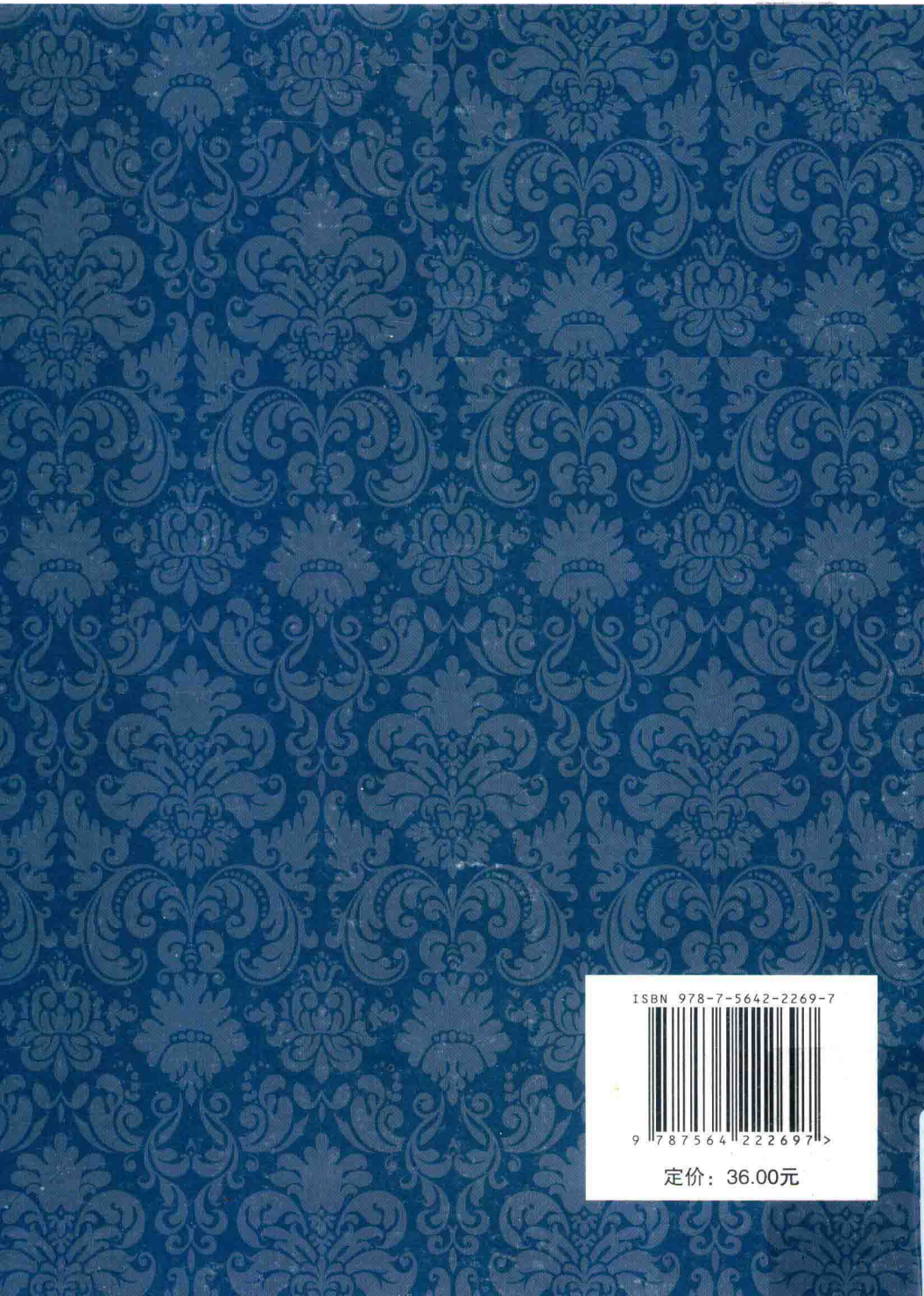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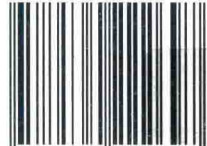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ISBN 978-7-5642-2269-7



9 787564 222697 >

定价：36.00元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经典译丛

资本及其结构

[德] 路德维希·拉赫曼 著
(Ludwig Lachmann)

刘 纽 译
熊 越 蒲定东 校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及其结构/(德)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
著;刘组译;熊越,蒲定东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1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ISBN 978-7-5642-2269-7/F·2269

I. ①资… II. ①拉…②刘…③熊…④蒲… III. ①资本结构—
奥地利学派—研究 IV. ①F275②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9566号

□策 划 吴晓群 宋澄宇

□责任编辑 吴晓群

□封面设计 张克瑶

ZIBEN JIQI JIEGOU

资本及其结构

[德] 路德维希·拉赫曼 著
(Ludwig Lachmann)

刘 组 译

熊 越 蒲定东 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 邮编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700mm×960mm 1/16 8.75印张(插页:2) 130千字
定价:36.00元

图字:09-2015-559 号

Ludwig Lachmann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Copyright © 1978 by 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was published by Bell & Sons, Ltd.,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1956.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Copyright © 2015.

2015 年中文版专有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总序

——“人的行动”的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丰富，它涵盖了方法论、经济理论、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有理论，也有政策，是真正的跨学科。也许正是由于其理论体系的丰富性，不少人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离破碎的，各个理论相互之间缺少关联。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确的看法，本文将以此套丛书的主要主题，即利息、时间、资本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为例，说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整体性。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各种具体理论一环一环扣在一起的是“人的行动”思想，“人的行动”贯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派的独特之处。

一、“人的行动”贯穿了利息、时间与资本结构思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明确地指出，利息源于人的时间偏好。利息产生的唯一原因是人们有“正的时间偏好”，即人们对于当前在手的物品的评价要高于未来才能到手的同一物品。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一件未来的物品，在现在评价时，其价值要低于在未来某个时刻的评价。因此，利息可以看作是现在与未来“交换”的产物。由于任何生产都要花费时间，所以生产者、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在做出市场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利率现象。如庞巴维克所说，人们往往“低估未来”，对同一物品，人们偏好现在而不是未来的物品，“目前物品通常比同种类、同数量的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由于主观评价的结果决定客观交换价值，目前物品，通常比同

种类、同数量的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和价格”。〔1〕由于人们对同一物品现在与未来价值的评价是不同的，“不管什么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只要有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相交换的场合，利息总是会出现的”。〔2〕由于利息是时间偏好的产物，因此利息是不可能消除的。

在利息问题上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认为利息源于“生产力”，由于资本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因此贷款人要给借款人一个回报，利息就是使用资金的回报，或者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对此，米塞斯予以明确的否认。他说，通过延长生产时期能增加单位投入的产出数量，或生产那些短时期内根本不能生产的产品。但是，却不能因此认为这样增加的财富价值就是利息的来源。〔3〕在米塞斯看来，“利率”纯粹是“时间”现象，与资本或资本品没有关系，尽管利率很典型地出现在使用资本的世界中，但利率绝非资本的生产力回报。“利率”与“生产”的关系不是资本的生产“产生”了利率，而是由于任何生产都要花费时间，因此生产者、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在做出市场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利率现象。

“时间偏好”属于“人的行动”范畴，不属于“心理”范畴。米塞斯从其“人类行为经济学”方法出发，认为，虽然庞巴维克意识到人类的“时间偏好”是普遍存在的，但庞巴维克的“时间偏好”论是建立在“心理”考虑之上的，而“心理因素”不能证明“时间偏好”规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适用。〔4〕

要正确地理解利息，就必须正确地理解时间。“时间偏好”中的“时间”不是“平均生产时间”，而是一个属于“行动学”范畴的概念。“生产时期”在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完全存在于行为人在不同长度的生产时期之间的“选择”，“生产时期”是由选择构成的，物理意义上的生产时期长短在米塞斯看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庞巴维克之所以在利息问题上表现出折中的“二元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认识到时间的“行为学”性质，而把

〔1〕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53 页。

〔2〕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62 页。

〔3〕 Mises, L. Von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Third Revised Edition. Fox & Wilkes San Francisco, 1966, pp. 526—527.

〔4〕 Mises, L. Von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Third Revised Edition. Fox & Wilkes San Francisco, 1966, p. 485.

时间理解为“平均生产时间”，这导致他一方面认为利息源于“时间偏好”，另一方面又认为利息源于“生产力”。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利息又源于时间偏好。对时间的认识，决定了对资本的认识。我们同意哈耶克的观点：“资本问题实际上是个时间问题”。哈耶克指出，“时期”不是单维的。在他看来，不同要素具有不同的投资时期；如果用单个时间维度，如“平均生产时期”去描述这些各异的投资时期，是不可取也是不能允许的。^[1]哈耶克在这点上可谓一针见血。以生产眼镜为例，假如生产镜架的时间是2天，生产玻璃片的时间是1天，我们可以说生产眼镜的“平均时间”是1.5天吗？显然不能，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个“平均时间”没有意义。哈耶克正确地指出，社会生产是相互联系的，“生产时期”是多维度的矢量，不同产品的“生产时期”不能加总测量，不能“平均化”，社会的“平均生产时期”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进行比较。“单一的生产时期”或“平均的生产时期”等是没有意义的抽象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与真实世界没有多少联系。“平均生产时间”的概念导致了资本的“基金论”，因为时间可以平均，资本必然就被看作是能够自动地自我复制、保持或扩大自身规模的“基金”。而按照奈特的资本“基金论”，资本一旦存在，就能自发地进行再生，所有资本都是概念上的、永续的，资本的替代是理所当然的。

以奈特和克拉克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是“基金论”。在“基金论”中，资本是没有“时间”内涵的，因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是同时发生的。不同于“平均生产时间”，米塞斯与拉赫曼等人采用的是“个人”的与“主观”的时间。在这种“主观的”时间观的基础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结构的”，他们提出的资本结构论迥异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基金论。人们一般只看到资本的总量，而忽视资本的结构，实际上资本“结构”的变化远比“量”的变化更重要，“总资产值的变化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会发生，就如同温度计不能告诉我们病人是患有疟

[1] Hayek, F. A. (1936),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0.199-228, p.206.

疾还是流感”。〔1〕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研究资本时把目光聚焦于人的行动,而非资本品上,认为资本必然与个体的计划或预期联系在一起。如哈耶克就认为,资本理论的基础应该是“个体的决策”。〔2〕资本品“没有用”,并不是因为失去物理用途,而是不再进入计划。“结构”的含义即资本必然表现出特定形式的复杂关系。〔3〕资本有不同的功能,必须结合使用,计划的改变将改变资本的结构(组合),原来的结构将不复存在。不同人有不同的计划,资本在“计划中”得到使用,资本只有进入一个生产计划,参与一个生产过程,才产生互补性;〔4〕当计划被修改时将产生替代效应,原先有用的资本将被剔除、被替代。因此,在给定的计划下说互补性才有意义,而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讨论“互补效应”时不涉及当事人的计划,认为互补性就如同磁带和录音机之间的关系那么客观。

凯恩斯的理论中没有“个体的计划”,因此也就没有资本结构的思想,在他看来,“新的资本组合出现在原来的资本组合中,而不会对原先的有改变”。〔5〕这一论述与现实不符,这也是哈耶克说凯恩斯缺少一个资本理论的原因。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服务流,而同样的资本品在不同的结构中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服务流。即便是在资本品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计划的改变也会导致资本结构的重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资本市场上,当一个企业宣布某项计划时,股价就会发生变化。每个企业都在尽可能地优化其资本结构,有的可能是扩张,如阿里巴巴最近进行的并购,也有可能是缩减,如海尔最近宣布的裁员。如果仅仅考察一

〔1〕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36.

〔2〕 Lachmann, L. M. (1982), *The Salvage of Ideas: Problems of the Revival of Austrian Economic Thought*. In Littlechild, S *Austrian Economics*, Vol. III. Edward Elgar. 1990, p.338.

〔3〕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59.

〔4〕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56.

〔5〕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58.

个社会资本“量”的变化，而不去考虑资本“结构”的变化，那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根据资本结构理论，资本不能简化为“量”并用“量”去描述。

套用哈姆雷特的话，资本是“量”还是“结构”，这是一个问题。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就是把资本当作“量”来考虑的，假如人们意识到资本不是“量”而是“结构”，那么我们会认识到这种增长理论的基础存在缺陷。显然，我们更应该关注资本结构问题。如克莱因所说，“现代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资本结构问题，即资本应该怎样分配于各种经济活动中？”^[1]资本结构理论有着巨大应用前景，它的价值显然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下面谈谈它与商业周期理论的关系。

二、商业周期与资本结构的混乱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企业家改变计划，资本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如果企业家的计划错乱，就会导致资本结构紊乱；如果企业家们的计划普遍发生错误，那么资本结构将出现严重混乱，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商业周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用“生产结构”的扭曲来说明商业周期，但“生产结构”这个概念的主观主义色彩不如“资本结构”那样鲜明，因此，用资本结构的混乱来说明商业周期更能体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特色。那么企业家制订计划的时候为什么会普遍地发生错误从而导致商业周期呢？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的干预，从而使市场信号失去应有的功能。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商业周期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干预扭曲货币、银行这些重要的市场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本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但由于政府的干预，这些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德索托教授的《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一书正是以米塞斯的货币和银行理论为基础，从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两个方面，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全面阐述的著作。

人们往往把“货币”(money)和“通货”(currency)相混淆，在日常生活

[1] Peter Klein(2010), *The Capitalist and the Entrepreneur: Essays o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11.

中使用的“货币”是政府发行的纸币，但纸币其实是“通货”，不是真正的货币。货币本质是黄金，而通货是政府发行的信用媒介（法币），与黄金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符号，甚至一个数字，本身没有价值。政府发行的通货取代货币，是发生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之一。

米塞斯认为，“信用媒介”是一种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的货币。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媒介与货币具有相同的功能，但信用媒介更容易扩张，这种信用媒介的扩张会导致市场利率系统性地低于自然利率，或者说信用媒介没有扩张时的利率，低利率将刺激企业家扩大生产，出现上文说的“企业家计划的普遍错误”，导致生产结构（资本结构）的变化不符合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企业家将投资在被人为压低了的利率下看似具有“营利性”的项目，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但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增加，增加的只是信用媒介。投入新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然要以其他企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减少为代价，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并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造成了繁荣的假象。

但是，这个繁荣的势头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市场参与者会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储蓄去满足所有的新投资项目；当所有的这些不良投资被发现并清偿时，这种虚假繁荣的泡沫就破裂了”〔1〕。如罗斯巴德指出的，生产过程总是比货币的流通过程更长，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前，物价就已经上涨了，物价的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将被侵蚀，那些在信用扩张（低利率）的情况下看上去具有盈利能力的项目就不再是盈利的，而是投资失误了。一旦银行为防止货币体系的崩溃而采取措施终止信用的扩张，一些企业就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而另一些企业将关门或破产。

在信用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远离消费品的一端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靠近消费品的一端，由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下降，即使企业提高消费品价格，可能也不足以弥补要

〔1〕 Peter Klein(2010), *The Capitalist and the Entrepreneur: Essays o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182.

素价格的上涨。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生产结构的扭曲”，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资本结构的混乱”。

吊诡的是，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一边是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另一边却出现“钱荒”，即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更高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信用扩张促进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大量的信贷资金都流入投机性的领域，追逐实体经济中难以获得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借贷利率提高了，对需要资金的企业来说，市场利率的提高即意味着需要支付比原先更高的融资成本。“货币数量论”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根据该理论，可以用多印钞票的办法解决“钱荒”问题，但这一办法显然是饮鸩止渴。

信用扩张也与银行制度的扭曲有关。银行制度的扭曲，集中表现在“中央银行”和“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上。“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是指银行的贷款并没有黄金和储户自愿的储蓄做后盾，或者说银行把储户的活期存款都贷出去了。储户（尤其是指活期存款的储户）把资金放在银行里是为了获得安全和随时提取的便利，储户有随时把资金提取出来的权利，银行在未经储户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这部分资金贷放出去，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支付问题，并且显然是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权，剥夺了该储户存款的一部分购买力，也违背了货币本质上是黄金的原则，“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实际上是违背私法的行为。

“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非法地扩张了信用，银行也正是利用储户不会集中地提取存款来获利。假如储户都向银行提取存款，银行必然破产，但是在没有信用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这种银行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为它提供了保障，更准确地说，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了以部分储备就可以实施信贷扩张的“特权”。那么为什么政府要给银行特权呢？答案在于，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互利关系：政府可以利用银行发债，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信用扩张，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而不必求助于税收；而银行在信贷扩张中多“销售”了本不存在的货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还不用承担信用扩张的风险，因为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让中央银行承当。正是政府在背后的怂恿，让银行堂而皇之地践踏私法，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财产权。

如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早已论述的,如果政府从未为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采取干涉行动,如果政府从未解除某些银行遵照契约清偿债务的义务(在市场经济里面,这是所有个人和所有商号必须履行的义务),就不会有什么银行问题出现。每个银行对于自己的偿付能力的考虑,就可以使它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不敢过分发行信用媒介,否则就会破产。但如果有了中央银行,情况就不同了——有了中央银行这个依靠,商业银行就会肆无忌惮地扩张信用。

可见,用于交易的媒介只能是真正的货币,企业家投资的资金只能来自于自愿的储蓄,即可转作生产资源的真实消费品的节约,而不是信贷扩张产生的货币资金。然而,在政府干预货币和银行体系之后,出现了两个“没有支持”:作为交易媒介的法币没有黄金支持,用于投资的信贷没有真实的生产资源支持。

三、干预主义者的理论中没有“人的行动”的因素

门格尔早就指出,货币和语言一样,是一种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而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对传统法律原则和产权制度的破坏,使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失去其应有的协调功能,导致企业家在制订计划时普遍发生错误,致使资本结构出现普遍的混乱,这样就可以把经济危机问题归为“人的行动”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忽视“人的行动”,或者说在理论体系中排除“人的行动”,也正是干预主义理论谬误的根源。

在干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人的行动”的因素,这一点在价格理论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价格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价格包含了无数个体的知识(观念、预期和判断),价格反映、传递和整合不同人的知识,将知识从一个角落传递到另外一个角落,这个传递知识的过程也是协调不同人的行动,使经济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也就是拉赫曼说的“使分散的计划趋向一致”;〔1〕与之相反,干预主义者则把价格当作参数,认为价格是

〔1〕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 61.

以人为地调整,是实现干预者预想的均衡(市场出清或最大化)的工具,在这种理论体系中,知识被视为给定的技术和偏好,在做出这样的假定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求解实现均衡的价格。干预主义者没看到价格是在人的行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最适合于现代文明的价格体系乃是通过某种奇迹而自发形成的”,^[1]“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2]德索托也指出,“价格不是人们要去适应的给定物。相反,正是不断行动的人,创造价格并调整它们”。^[3]

不难发现,对于价格,凯恩斯正是采取了后面这种理解。在他的理论中,只有设定价格参数的“干预者”,但没有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人”。也就是说,凯恩斯所犯的错误和兰格等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把价格设想为参数,是干预者可以任意调节的工具,他们没有看到,市场价格是行动人的产物,是所有市场主体共同创造出来的。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但使用的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新瓶装旧酒”,他无非用“充分就业”代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在继承新古典方法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个体不是“行动人”,是没有学习能力的,市场是干预者可以调节的机器,诚如拉赫曼所说,“凯恩斯并不懂得市场是人们交换知识的制度”。^[4]

本套丛书侧重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货币、资本、利息、商业周期、私有产权、市场组织与企业家才能等方面,对这些主题的研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拳头产品”。这些主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想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就不可避免地要从这些主题入手。换言之,我们无法逃避这些主题,它们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并且,相比其他经济学派而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这些主题上所做的研究是最深入、最有说服力

[1] 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页。

[2] 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1页。

[3] 参见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著,朱海就译:《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48页。

[4] Lachmann, L.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 p.70.

的。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缜密的逻辑，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反复的验证，因此备受人们的推崇。对任何一位试图了解经济世界运行奥秘的人来说，本套丛书都是必读的佳作。

朱海就

2014年11月3日于杭州

中文版前言

受译者之邀撰写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中文译本的前言,我感到十分荣幸。

路德维希·拉赫曼曾是我的老师,是他将我引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殿堂,启发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进行研究。

拉赫曼教授是一位尽职的老师,也是一个可敬的人。尽管相对而言,他的学术贡献并非十分丰硕,但作为学者,他见解深刻、学识惊人。他的个人学术网络遍及世界,这也令人印象深刻。

拉赫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之时,得以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共事,他从那时开始涉足资本理论。

当时为了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哈耶克本人在积极研究资本理论,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对于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颇有挑衅意味的研究中的缺陷是非常必要的。

也正是从哈耶克的研究中,拉赫曼得到灵感并发展出自己的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把哈耶克的研究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拉赫曼就资本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而本书正是这些成果最为成熟的结晶。

也许在拉赫曼的图景^[1]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预期**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他同意凯恩斯“预期”这一很重要的说法,但强烈认为凯恩斯没有对此给予充分说明,特别是在他的投资理论里面更是如此。凯恩斯和其他所有的理论家都倾向于忽略资本品的异质性本质,并将资本视为同质的**存量**,而非互补项目——一些比另一些更具可替代性——的**结构**。他也正是主要基于这一见解创建了自己的资本理论。

在本书首次出版的1956年,凯恩斯革命正当其时,而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则已消退。拉赫曼离开了英国,远赴南非。因此,本书一开始反响平平,几乎被人忽略。然而,到1978年本书再版之时,奥地利学派之星已再度升起。哈耶克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也再度兴起。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奥地利学派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更是在全世界欣欣向荣。这本书现在已被视为其中的经典之作。

路德维希·拉赫曼将会很高兴有更多的新读者能够阅读到他的著作。我对此也同样开心。

彼得·列文

(Peter Lewin)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5年3月

[1] Lachmann's vision 译作拉赫曼的“图景”。在第四章还会提到凯恩斯的“图景”。我们将“图景”指称经济学家理论分析前的意识行为,是指研究者本人对整个经济进程和社会结构的想象(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如熊彼特把资本主义想象为“创造性毁灭”,马克思则认为“资本积累大众日益贫困”,熊彼特特别强调“想象和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作用”。凯恩斯的“图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的第二章已有所隐现,它在后来有个更恰当的称呼——停滞论,是指投资机会消失而社会逐渐趋向于某种静止滞涨状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中心论点是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面对不确定性,流动性偏好过高导致利率过高,然而私人投资是“动物精神”驱动而没有理性计算的基础,资本市场本身是流动性市场而非资源配置市场,所以资本边际效率常常达不到利率标准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拉赫曼认为应该包括在凯恩斯“图景”中的内容。所有相关的熊彼特论述,参见《从马克思到凯恩斯》(*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中“凯恩斯”条目,特别是第235和第236页,《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History*)卷一第73~77页,卷三第601~602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第十章和第559~565页,以及《经济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中“科学与意识形态”条目。——译者注

中文版引介

尽管拉赫曼确实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Austrian Economist),但他并非在奥地利出生,而是在德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他在20多岁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发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著作,进而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结缘并为之着迷(他第一次与米塞斯见面是在1932年)。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研究、致力推动、理解并欣赏奥地利学派上。(Mittermaier, 1992; Grinder, 1977b)

1933年,拉赫曼在完成早期教育之后,就与其未婚妻玛格一起离开德国来到了英国。他因而避开了纳粹党的崛起,因为作为犹太人,他本会成为种族灭绝的目标。尽管他在柏林已经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但他在英国还是无法找到一个学术职位,于是他决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哈耶克的学生(Mittermaier, 1992:9)。这将他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约翰·希克斯(Hicks, John Richard)、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阿巴·勒纳(Abba Lerner)、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等学者一起,置于充满活力的新“哈耶克主义”经济学派的正中心,而这也正是哈耶克主义者和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急速升级的论战中心。当时他已经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有了好感。

因此,拉赫曼对资本理论的兴趣产生于这些话题争端,它们关乎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源自米塞斯以及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基石)。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源于卡尔·

门格尔(Carl Menger, 1871),是奥地利学派当时最著名的贡献,这主要归功于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研究。庞巴维克的研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1959,原本为在1884~1912年间出版的三卷本)。哈耶克在对经济周期富有影响力的研究里(Hayek, 1933, 1955),曾参考并利用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而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工作,都在致力于详细阐述该理论,并使它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人接受(尤其是英语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其中一些收录在Hayek, 1939),并最终在《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里达到了顶峰。正是这些著作对拉赫曼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并对他随后形成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以及他在本书中非常持久地专注于预期这个话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拉赫曼曾有一段时间困惑于人们的预期对其行动的影响,并感到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5)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里,以及他与凯恩斯在凯恩斯出版《货币论》(*The Treatise on Money*, 1930)之后的争论里,都疏于足够强调预期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作用,以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反驳。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出版之后,哈耶克阅读了这本书,他惊讶地发现凯恩斯广泛地处理了预期。拉赫曼由此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对预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预期的主观主义含义则成为激励他余生研究的主题以及其资本研究中的亮点。

拉赫曼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继续,并与其预期研究相结合(Lachmann, 1937, 1938, 1939, 1941, 1943, 1944, 1945, 1947, 1948)。这项研究始于哈耶克—凯恩斯论战的背景以及大萧条的冲击,伴随着拉赫曼对于“继发萧条”本质的探索,但在之后得以发展并完成超越。它最终在许久之后的1956年,在这本《资本及其结构》里达到了顶峰(Lachmann, 1978[1956]),而当时他已在远方,且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在凯恩斯革命的凯旋之下已消失殆尽。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无疑在精神上继承了哈耶克。然而,它也与庞巴

维克的研究紧密联系,拉赫曼以一种适应现代真实世界生产情景的形式,仔细而批判性地重构了庞巴维克的洞见。他的方法反映了他看到的**资本、知识和预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需要明确地表达出来以完满回应凯恩斯主义所挑战的事物的含义。

拉赫曼在以下著名引述中解释道:

经济学家离不开通用的资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这一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对应;它反映的是企业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啤酒桶与鼓风机、港湾设施与酒店房间里的家具,它们成为资本的原因不在于其物理特性,而在于其经济功能。某物是资本的原因在于市场(也就是企业家的共同认识)认为它具有产生收入的能力。……(然而)社会中使用的资本存量并非以一幅混沌的图景呈现。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些秩序在其中。(Lachmann,1978)

资本存量的价值依赖于个人预期和评值,它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观察到的现象。只有在均衡条件下,此时所有个体的预期都相互一致,这样的价值才有意义。因此,他提供了一套**资本结构理论**而非**资本存量理论**,并强调了资本的异质性。资本品在物理上形态各异的这一事实之所以很重要,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均衡(disequilibrium)^[1]。倘若可以将不同资本品的价值简单累加,那么物理上的异质性就能归约到价值的同质性上。不均衡意味着个体有着不一样且经常不一致的预期,所以我们不能将个人的评值简单地累加。这就意味着资本存量的整体度量是不连贯的,并且不能认为这指示着经济体中生产性资本的客观价值。

拉赫曼认为,尽管资本存量是异质的,且不能被有意义地加总,然而它并不是无定形(amorphous)或者无意义的。资本存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一个又一个实际关系,因为它们共同执行着某些特定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资本组合。如果我们理解资本组合的逻辑,就能赋予资本结构以意义,并且由此就能够设计恰当的经济政策,或

[1] 非均衡或者不均衡,都是指没有达到均衡,如非均衡的分析方法或者不均衡的状态。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认为是均衡达到前的波动,而在奥地利学派则不一定关注最终是否会达到均衡,而是从它本身可能的发展过程出发进行分析。

者更重要的是避免不当的政策。

理解资本组合,需要理解**互补性**和**替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适应于这样的世界:感知价格即为**真实(非均衡)价格**(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反映了不一致的预期),而发生变化会引起长期而可见的调整。如果资本品协同一起在为一项给定的生产计划发挥作用,它们就是**互补的**。一项生产计划由一套给定目标的事务来定义,对它们来说产品就是手段。只要这项计划顺利完成,所有产品便都是相互互补的关系。它们是同一计划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互补关系可能会非常复杂,而无疑它们会涉及生产和销售的各个阶段。

在一项生产计划(部分或整体)失败时,会发生替代。当计划的部分元素失效,人们就必须寻求应急的调整。因此,我们就必须用一些资源来替代另一些资源。例如,备件或额外库存的作用。因此,互补性和替代性是世界中不同状态的属性。同一个物品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互补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替代品**。替代性只有在一系列应急事件能够显现时才能衡量其程度。可能会出现某些事件,譬如巨大的技术变革,假如没有预料到这些,就会使某些生产计划变得毫无价值。与之关联的资源将不得不整合到另外的生产计划里,或者干脆报废——因为它们可能一直无法加以利用。这是经济过程的自然结果,它主要由试错发现新的、更好的产出和生产技术来驱动。面对变化,决定任何资本品命运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放入别的资本组合,而不损失其价值。资本品发生**重组**,那些完全失去价值的就会被抛弃。也就是说,资本品虽然是异质且多样的,但它们却常常能执行许多不同的经济功能。

拉赫曼以互补性和替代性为据的资本分析,与投资理论(他指出正是投资理论必须暗含一个资本理论),尤其是与凯恩斯的**边际效率概念**(这一概念缺乏对这种理论的承认)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投资增长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现有资本结构的形状及其与新投资的互补程度。

本书与拉赫曼的导师及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之间的关系颇为有趣。在被问及《资本的纯理论》时,哈耶克曾这样评论,“我认为从我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有用的结论,其实在拉赫曼关于资本的书里”,并且他认为拉赫曼所说的可能就是全部能说的(what Lachmann said is per-

haps as much as could be said)。哈耶克继续说：“和我自己在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尝试一样，恐怕这本资本理论著作更多在展示我强调过的东西——现象常有的复杂性、数据的不可知性等——的一种阻碍性，这些东西确实更多地在指出我们可能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不是如何使特定预测成为可能。”（引自 Kresge and Wenar, 1994:142）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正如在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中所展示的那样，声名远扬且为沿奥地利学派传统研究的学者所尊崇。然而第七章却有些例外。它包含着谜团，即拉赫曼所推荐的政策看起来与他对动态经济体中的资本的观点不是很协调。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章，而一些人则试图去解释它。中国的读者现在可以就这场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资本的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这本著作有着惊人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它被译成中文值得庆祝。

彼得·列文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5年3月

参考文献

Böhm-Bawerk, Eugen, von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in 1), South Holland; Libertarian Press.

Grinder, W. E. (1977a),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the Market Economy*, Kansas City: Sheed, Adrews and McMeel.

Grinder, W. E. (1977b), “In Pursuit of the Subjective Paradigm”, in Walter E. Grinder (ed.) (1977a), 3—24.

Hayek, F. A. (1933),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London; Jonathan Cape.

Hayek, F. A. (1935),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A. (1939),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Routledge.

Hayek, F. A. (1941),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ynes, John Maynard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Cambridge, Macmillan.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ambridge, Macmillan.

Kresge, S. and Wenar, L. (eds.), (1994),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chmann, L. M. (1937), "Uncertainty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Economica* 4 (August) 295—308;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29—41.

Lachmann, L. M. (1938), "Investment and Costs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8, September: 469—481;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42—56.

Lachmann, L. M. (1939), "On Crisis and Adjust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1 62—68;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76—90.

Lachmann, L. M. (1941), "On the Measurement of Capital", *Economica* 8, May: 367—377;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91—106.

Lachmann, L. M. (1943),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Economica* 10; reprinted in Grinder, W. E. (ed.), (1977), 65—80.

Lachmann, L. M. (1944), "Finance Capitalism", *Economica* 11, November: 64—7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107—123.

Lachmann, L. M. (1945), "A Note on the Elasticity of Expectations", *Economica* 8(November) 248—25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124—130.

Lachmann, L. M. (1947),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ion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 14, 108—119.

Lachmann, L. M. (1948), "Investment Repercus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3, November: 697—713; reprinted in Lavoie, D. (ed.), (1994), 131—146.

Lachmann, L. M. (1978)[1956],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Chinese edition, 2015].

Lavoie, D. (ed.) (1994),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 Es-*

says in Economics by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enger, C. (187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Mittermaier, K. H. M. (1992), "Ludwig Lachmann(1906—1990): A Biographical Sket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60(1), 7—25.

第二版序

在经历了 20 年对“资本理论”的激烈争论之后，笔者出版了一本讨论资本的书。我对第二版未做修改，在此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

我未做修改的第一个原因是，构成本书主题的问题与现在争论领域内的论题几乎毫无关系。这本书处理的是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结构，而不是流向不同阶层所有者的收入。以哈耶克教授在 36 年前的构想来说，它主要关心的“将是概括讨论在不同条件下，创造什么样的设备最有利可图，以及在任何时候现有设备将被如何使用，而不是去解释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定存量的生产设备的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入”。〔1〕索洛 (Solow) 教授在 1963 年给了资本理论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任务：“简单地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利息理论，而不是资本理论。”〔2〕那么，清楚区分哈耶克式的资本理论与索洛式的资本理论，可能会有所助益。这本书属于前者，后者所经历的兴衰对其并没有影响。

然而，资本理论从 1941 年开始就进展甚微。这本书成于这十多年后，旨在使经济学家意识到资本结构问题的存在性和紧迫性。但它马上就绝版了，并且没有被重印。

我这次原封不动地重印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源于以下事实：它写于经济思想的新纪元，亦即新古典无人质疑、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新古典风格的思考方式自身并不适合讨论资本的结构问题。这本书必须以某种非正统的方式来撰写。而现在对它进行修改，就犹如把一扇铁窗安装在一幢巴洛克式建筑上。

〔1〕 F. A. Hayek,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1941), p.3.

〔2〕 R. M. Solow,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 (Amsterdam, 1963), p.16.

在1956年本书首次出版之时,奥地利派经济学正处于低潮。比起主观主义,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计量经济学更感兴趣。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提醒他们,我们所处的现状和做判断所依据的现在,只不过是间隔在不可知的未来和不可撤销的过去之间的一块薄板,我们的知识就从中获得。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识,但其方法论上的某些含义仍未得到充分领悟。20世纪50年代对于主观主义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时代。预期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除了沙克尔(Shackle)在其开拓性努力中有所把握,其他人几乎都没能去领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持一种挑战姿态。在序言中,我曾写道:“本书中我们自己的方法遵循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另一股潮流,它的取向不是‘客观’和可量化,而是对现象的主观主义解读。”我不得不从这样的角度检讨现行的资本理论。

曾几何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特殊特征使我感到迷惑。作为其重要的且可能是最著名的组成部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却显得与主观主义方法论的规范并不相合。一般来说,奥地利学派学者都认同我们必须从个体出发,通过研究人们为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努力所造成的结果(这个结果也常常是在意料之外的)来做进一步的探索。另一方面,从庞巴维克起,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就在沿着另一条路径进行,并且几乎没有为个体行动提供丝毫空间。

不难看出,这与庞巴维克的思维方式有关。他是奥地利学派学者,同样也是李嘉图主义者,他问了一个老派的李嘉图式问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可扩张资本资源的所有者何以享有一份永久性收入呢?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求,使他建立了初步的资本结构理论作为解决手段。因此,他的理论看起来非常“客观主义”和李嘉图主义就丝毫不奇怪了。在我看来,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这个资本理论中注入主观主义,并且将资本现象与个体选择联系起来。

当然,“平均生产周期”的确反映了储蓄者—消费者的集体时间偏好,然而这种表达本身就标示出一个宏观经济实体。此外,这一概念只有在古典的单一商品世界(其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中才能得到衡量,但我们并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另一方面,在多种商品的世界里,资本的存量是异质的,我们面临着以个体选择的方式来解释其构成的任务。

在我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宏观加总的“资本存量”必须被分解为回应微观经济力量的更小实体,这些实体可以证明是个体选择行动的(间

接)结果。这样设想的资本理论必须始于生产的独立单位(或者说“企业”)的资本组合,如建筑、设备、机器、流动资本存量等的组合。我们从中发现了社会资本存量的“本质要素”,或者说其微观经济根源。在技术限制之下,这样的组合反映了其所有者和经理的生产计划。它当然不仅仅是相同“工业”中其他组合的复制品。预期的不同使得它们也不同。随着产品的差异化,变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资本理论,致力于寻找非永久性资源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所包含的意义,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即使在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里,每个公司也都有着领导者的个性印记。

我希望本书遵循的资本分析路径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此,今天的大环境可能比21年前更为有利,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长期通胀的时代,使以前被过分忽略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从这一点来说,资本替换和不当投资需要特别关注。

的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曾经一度认为资本维护给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维护给养失败会迅速使公司设备破损,开展业务所需的资本存量无法得到更新。因此,只有破产和接近破产的公司才会无法替换其资本资源。在任何一个资本每年正常累积的经济体中,我们都可以肯定,其已有资本存量会得到充分替换。新古典的“稳步增长”概念显然依赖于该假设。

现在,我们要试着去更多地怀疑。我们现在认识到资本替换远不是一种商业常规事务,而是一种最为棘手的活动。它必须依赖于对未来收入流和各种选择的主观预期与个体预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正确”折旧和替换方法这样的东西。不能再排除资本在一些经济部门里在销蚀,而同时在另一些部门里却在积累的这种可能性。

由于宏观经济思维被收入—支出模型(它没有资本盈亏的空间)主导,从而导致不当投资及其后果被忽略,这种错误尽管不可饶恕,但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认识到以下问题非常重要:不当投资的后果并不局限于与其直接有关的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所承受的财产损失,而是通过结构性互补网络,可能会扩散至整个经济体系。出现任何一种资本资源的不当投资,都将会影响它的维持和替代过程,也因此会影响其生产手段的产出,这反过来又可能会影响后者的维持和替代。

在我们这个持续通胀的世界,许多这样的问题都浮出水面。大家都知道,在通货膨胀下,一个企业负债越严重,看上去可能越能盈利,因为在

通常的会计准则下，资本以债权人的损失为代价使其所有者受益，这必然会表现如利润。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这只是确定“真实利润”的各种困难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类问题的含义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都知道当政府当局控制价格时工业的苦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任意一轮的通胀中工业价格都是到最后才上涨的，但是前述的资本替换及其后果的影响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在希克斯所说的“固定价格”与“弹性价格”同时存在的世界，如果一个行业的产出价格属于前者，而其大部分投入价格属于后者，那么它大概就和产出价格被控制的行业处于相同的境地。

无论如何，想要获取当前替换成本的信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埋怨估算利润的会计准则明显不合理也无济于事。同时，这些准则有转变成商业制度的趋势，而这个制度是决策者不敢忽视的，即使他们完全明白在危急关头的真实问题所在。此外，就如索罗门·法伯坎特(Solomon Fabricant)提醒我们的，考虑到工厂和其他建筑，情形就更加艰难了。比如，从不同来源所收集并发表在《今日商业调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中的建筑数据，质量就良莠不齐。其中一些关乎完成结构——建筑的成本，但另一些只是与建设中使用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有关，而对其他投入或者生产性变化几乎不加考虑。^[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替换确实是一项多少有些难以把握的经济活动。

我们周围的世界有大量问题与本书描述的结构化资本理论密切相关。我希望其中一些能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

路德维希·拉赫曼

纽约大学

1977年1月

[1] Solomon Fabricant, "Towards Rational Accounting, in an Era of Unstable Money, 1936—19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16 (December 1976), p.13.

序

长久以来,资本理论就一直处于一团迷雾之中。二十年前,奈特教授开始抨击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资本理论,在大西洋两岸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而今天,几乎很少有人会谈及这一切。人们的兴趣中心已经转向了别的领域。

实际上,与资本相关的问题绝不会丧失其吸引力。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使用“资本”这个词。但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经济学家们却都已停止追问关于资本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奇怪的“忽略”,看上去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许多经济学家显然都倾向于认为,要讨论与资本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到资本理论的概念框架,或者至少对于近来实践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此,如投资问题。换言之,这种“不需要建立一套资本理论”的观点已经大行其道。我将在本书中驳斥这一看法。如果对(资本)存量的本质和组成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就不可能讨论存量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只有将这个存量中所有真正发挥作用的特征都抽象出来,才能分析它变化的起因与相应后果。就如所有其他问题,我们也必须在资本问题的讨论中使用一个连贯的参考框架。

如今,忽略资本理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当今表述和论证中对精确量化方式的过分关注。大多数当代经济学都装扮在量化方法的外衣下。这里我们不讨论为何会出现这种偏好。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家们在阐释其理论时花费很大的精力来量化术语,只不过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然而,为什么这种量化做法在资本理论中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存在问题?在大多数商业交易中,资本被当作一个数量来处理了。在所有的资产负债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账户”这一项。*

然而,事实却是,人们所付出的长期努力只不过证明了想要找到一个严格满足经济学思想要求的资本的量化形式表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只有在均衡条件下,“资本的数量”才是有意义的概念。这本书中,我尝试去寻找这个结论的某些含义。所有量化的企图长久以来都被证明无法驾驭资本概念的这一事实,无疑就是人们对资本理论丧失兴趣,进而使其缺乏进展的原因之一了。

第三个原因,与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紧密相关,它似乎就在于资本与知识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市场和工厂里,耐用资本品的不同用途反映了其操作人所积累的使用经验和知识。但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无法轻松地处理这种非数量的变化;知识与资本一样无法通过量化方式驾驭。随着时间的流逝,知识的传播和获得一定会发生,然而这两者在任何意义下都无法成为关于时间的“函数”。现代经济学家不安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假设一个“给定的知识条件”来回避该问题。然而,如果认真考虑这一假设,显然会使我们无法思考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举例来说,如罗宾逊夫人所说,“在给定的知识条件下生产方法的改变”,严格来说,这就是一种表述上的自相矛盾。特别是对于耐久资本品来说,这个假设变得更站不住脚。毕竟,我们的火车不是由技术知识停滞在一百多年前的人来驾驶的。

资本理论是一种动态理论,这不仅因为很多资本品是耐久的,而且因为这些耐久资本品“一生”使用方式的变化都反映了知识的获得与传播。

本书中,我们的方法遵循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另一股潮流,它的取向不是“客观”的和可量化的,而是对现象的主观主义解读。最近,许多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把其创造性放在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严格教条来塑造这门学科。他们甚至将价值理论都塑造得与行为学家的严格规则相一致;现在,好像除非他们向我们“揭示”一些什么规律,否则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对人

* 会计学角度的资本账户。——译者注

类的偏好一无所知。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没有成功。事实就是，“某些现象发生的原因不在于‘情况事实上是怎样’，而在于活跃的心灵对于这种情况的把握”，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经济学这门科学近一百多年里最大的两个进展——主观价值论和预期的引入——才得以成为可能。

经济学家离不通用通的资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这一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对应；它反映的是企业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啤酒桶与鼓风机、港湾设施与酒店房间里的家具，它们成为资本的原因不在于其物理特性，而在于其经济功能。某物是资本的原因在于市场（也就是企业家的共同认识）认为它具有产生收入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现象无法通过明白且毫不含糊的概念来把握。（然而）社会中使用的资本存量并非以一幅混沌的图景呈现。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些秩序在其中。本书将致力于探寻资本秩序的问题。

因此，本书的主要目标是重新唤起人们对资本的基本问题的兴趣，并非呈现一套关于其封闭的一般化系统；也为了描述一种新的方法，并且展示了从资本的生产力到“强繁荣”的突然停止等这样的很多问题，这种方法都可以成功地加以应用；还为了指出某些长期被忽略的经济事实的含义；而最重要的就是强调知识的传播和（作为所有经济过程终极主体的）心智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中留下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尚未能解答。这很令人苦恼，然而却很难改变这点。但我仍希望有人可以接力求解，并在资本理论方面做出贡献。现在几乎可以说，物质资源使用模式的系统研究会经济研究中最有希望产生富饶成果的领域。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资本结构、经济系统中不同资本资源安排的秩序等概念也能被量化表述；毕竟任何秩序都可以用数字加以表述。不论如何，这样的发展肯定会很受欢迎。但是，撰写本书是因为目前我们极其需要一个一般的资本概念，而到今天为止所有的量化努力都很不成功。

我最深切的感谢要送给 F. A. 哈耶克教授，他的资本理念对我思想的形成助益最大。F. W. 佩什教授于 1952 年作为一个信托基金访问讲师来到这所大学，尽管他非常繁忙，但依然阅读了多个章节的手稿，我对其睿智的评论和建议表示感谢。佩什教授对现代商业金融错综复杂的系统的

准确解读,使我在写作第七章最终版本时收获巨大。当然,无须讳言,本书文责自负。

金山大学的朋友们对我持续的帮助和鼓励更是让我难以言表,尤其是 L.H. 萨缪尔斯先生和 T. 凡·瓦斯迪耶克(Waasdijk)先生,他们耐心地阅读我的手稿,给出颇为有益的评论和建议,从而使我得到了许多无法从他处获得的收益。

感谢我所在大学的研究委员会,他们慷慨的赞助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

最后,我还要感谢皇家经济协会,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的编辑和出版商,乔治·艾伦和爱文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图书有限公司,还有劳特里奇与开根·保罗出版社,感谢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的材料。同时,我还要对这些材料的作者表示感谢。

路德维希·拉赫曼

金山大学

约翰内斯堡

1955年9月